

《告诉我要杀谁》中流亡者的困境

李珂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告诉我要杀谁》是 2001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的杰作之一。作品中人物的流亡以对第一世界大都市的幻灭而告终,流亡者从中认识到自身的真实处境。通过呈现流亡者的困境——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作品揭示了前殖民地人民对原宗主国的模仿心态,反映了前殖民地国家独立后本土的文化和精神贫瘠以及思想意识方面对原宗主国的依赖。

关键词:《告诉我要杀谁》;流亡;幻灭;模仿心态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0)01-0117-04

The Plight of the Exiles in Tell Me Who to Kill

LI K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Hubei 241000, China)

Abstract: Tell Me Who to Kill, i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by V. S. Naipaul,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n 2001. The individual's exile ended with the disillusionment of the world's biggest metropolis, and the exiles realized their real existence. The work brings to light the former colonial people's imitation of their masters, their cultural and spiritual poverty after independence and their ideological dependence upon their former colonialist country through presentation of exiles' plight and the crisis of their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 Tell Me Who to Kill; exile; disillusionment; imitation consciousness

2001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V. S. Naipaul)被西方世界誉为当代经典作家之一,其作品《告诉我要杀谁》(Tell Me Who to Kill)是中短篇小说集《在一个自由的国度》(In a Free State)中的一部短篇小说。《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发表于 1971 年,“获得当年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被评论家普遍认为是奈保尔的杰作之一。”^{[1][139]}刻画前殖民地人在异域文化环境中感受到的疏离感和漂泊感,揭示殖民体系解体后新近独立国家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和人们的生存状态是作品的统一主题。《告诉我要杀谁》通过一个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印度移民后裔的叙述“不仅刻画了身处异国他乡的西印度群岛人在异域文化环境中感受到的疏离感和漂泊感,更重要的是涉及了殖民地人对宗主国的向往和幻想的破灭。”^[1]笔者拟探讨《告诉我要杀谁》中

流亡者的困境——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发掘隐含其中的深层文化蕴涵。

一、叙述者的双重流亡

故事主人公,一个西印度群岛殖民地人,不满故土环境的局限性,寄希望于宗主国大都市,但最终因幻想破灭和复仇的愤怒为结局。故事一开篇,主人公也即叙述者在陌生环境中的失落和孤独感便初露端倪。他去伦敦参加弟弟大友的婚礼,陪伴他的只有弗兰克。对叙述者而言,弗兰克是唯一对他好的人:“我失去了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朋友就是弗兰克……他们知道要去哪儿……我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哪儿。我只能等待将要发生的事。”^{[2][60]}接着故事时间闪回过去,叙述者讲述了在西印度群岛时的生活。对于故土西印度群岛甚至自己的家

收稿日期:2009-10-09

作者简介:李珂(1986-),女,安徽巢湖人,安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庭,叙述者都极为不满:“这世界在我看来多平庸,里面没什么好东西,除了甘蔗和沥青路,没什么可看的,从小我就知道我没生活了。”^{[2]164}“泥土、热气和烟尘都让人作呕……我觉得我要杀了任何让我痛苦的人。我不在乎自己。我没有生活了。”^{[2]165}叙述者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他的父亲没有受过教育,在乡下靠苦力养家。他的哥哥姐姐也读书甚少,继续着父亲那样的老套生活。对此叙述者不无鄙夷之情,他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弟弟大友身上:“有些人太落后了,以致于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落后或者不去在乎了。像我父亲那样……他甚至取笑自己目不识丁……我决定不让弟弟大友这样。我觉得自己比家人更明事理,而他们却总说我动不动就生气。但我觉得我好像成了一家之主了。”^{[2]184}叙述者认为自己已经错过时机,是个失败者,生活黯淡,他决心尽己所能让大友受教育,出人头地。大友身上寄托着他要超越故土局限性、拥有美好生活的抱负和追求,成了他生活和奋斗的唯一中心。大友在城里叔叔家求学遇挫后,他酬钱送大友去伦敦留学,希望大友能成为专家。不久,叙述者来到伦敦照料据说在学习“航空工程”的大友。为了在异国他乡谋生,他不分日夜地拼命工作挣钱,钱慢慢增多让他逐渐摆脱了初到新环境时的失落和焦虑,有了成功和安全感:“一百英镑。我有了安全感。我说不清这种安全感有多强烈……我发现这钱让我强大了。正因为钱让我强大了我能忍受任何事……那一百英镑让我忘记了自己。它让我有了想法……我现在想要的不仅是安全感。我想让钱增多。”^{[2]187}“那钱让我觉得钱来得容易。那钱让我忘了挣钱有多辛苦……那钱让我觉得伦敦就是我的。”^{[2]188}辛苦攒下的钱让叙述者有些飘飘然,他相信自己能在伦敦拥有富足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然而,他的快乐时光是短暂的,他用全部积蓄换来的店铺经营惨淡,白人社会的歧视羞辱和规章制度使他的生意难免被毁的结局。弟弟大友却对此无动于衷,让他尤为痛心。但最终让叙述者万念俱灰的是,他发现大友并不在学习所谓的航空工程或计算机编程,而是整日闲荡、抽烟。他觉得自己的全部奋斗都被毁了,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一无所有的他悲叹道:“我看到我杀了自己。我最后的一点勇气也渐渐消失了。我一直知道那个我要买下伦敦的幻想是愚蠢的。现在那个幻想破灭了。没有了我存在邮局的两千英镑,没有了真正的现金,我就没有了力量……现在一切都让我痛苦……我觉得我的内心又充满了仇恨。”^{[2]194}

直到故事结尾,叙述者仍处于漂泊状态,无法确立自己的身份和真正归属,面对着过往的路人,他更觉幻灭和失根之痛:“他们有国家可以回归,他们有房子。”^{[2]195}“我觉得我无处可去,在伦敦的生活结束了。”^{[2]196}“生活结束了。我像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我来时一无所有,现在一无所有,走时一无所有。”^{[2]1106}作为一个西印度群岛前殖民地人,他终究只能游离于宗主国大都市的边缘,心中充满痛苦和复仇之恨,却又无法明白失败的原因,找不到可以发泄愤恨的敌人:“天哪,把敌人指给我看吧。一旦你发现谁是敌人,你可以杀了他。但这里的这些人让我糊涂了。谁伤害了我?谁毁了我的生活?告诉我报复谁吧……告诉我要杀谁。”^{[2]168}

疏离、错位感始终困扰着叙述者。宗主国文化观念的渗透影响使他不满足于甚至鄙夷故土的生活状况,他对宗主国大都市充满幻想,试图在伦敦追寻一种事实上永远不可能属于他的身份和归宿。但伦敦远非他幻想中的“希望之乡”,他最终沦为居无定所的漂泊者和没有归属的精神流浪者。与原先文化相分离,又无法被新环境接纳,叙述者哀叹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我感觉自己像个自由的人,嘲笑我所看到的一切。”^{[2]176}他的自由状态是一个迷失的局外人的处境,一个与外界断绝了联系、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无根状态。因此,叙述者的双重流亡“呈现了边缘化的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其象征是敏感、苦干、然而未受教育没有技术的叙述者)与现代的科技的第一世界(英国是其象征)的碰撞冲突。”^{[1]15}此外,“流亡不仅是远离本土家园,同时也是与另一个世界的中心相断裂的状态,是一种处于边缘位置时的思维方式。”^[3]故事叙述者也正是在流亡的痛苦体验中认识到了现实的冷酷,从对宗主国中心世界的迷狂崇拜和幻想中惊醒。

二、斯蒂芬的精神流亡

与故事叙述者的流亡大约平行发展的是其叔叔斯蒂芬的精神流亡。斯蒂芬受过教育,在城里工作和生活。他体现了殖民地国家里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本土知识分子的一些典型特征。“在殖民地世界,无论是本土人还是殖民者,他们都相信高等文化和意义来自别的地方。官方语言和作为殖民地教育一部分的殖民文学,与本地人的实际体验都不相吻合,两相一比较,他们便愈发感到自己地位的边缘化和处境的低下。”^{[4]122}斯蒂芬的思想和心理深受强势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不屑于本土的生存状态,认为

美好生活在宗主国,向往并盲目模仿宗主国文化。正如叙述者指出的:“他是个基督徒,或者他取了基督徒的名字以标榜自己的进步性。”^{[2]170}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送儿子去加拿大留学,梦想让儿子在大都市拥有富足的生活。对于住在乡下的叙述者一家,斯蒂芬则嘲笑、鄙视,不时显示自己的优越性。然而,这个令叙述者一家引以为豪的貌似成功、进步的城里人却也为烦恼、焦虑所扰。叙述者后来得知斯蒂芬一家的生活丝毫没有优越可羨之处:“那是个狭小的旧式房子,在城里的一片破旧的地块。可惜我还一直把斯蒂芬看作个大人物。现在我明白了,在城里斯蒂芬算不了什么,他的全部希望和他的女儿们的希望都在那个在蒙特利尔留学的儿子身上。他就像是他们的王子一样。在那个没有前院有没有后院的小房子里,他们就像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一样地生活着,他们的小客厅里摆着小幅的外国画和画有考究的家具的画。你感觉不得不弯下腰,如果像平时那样迈一步,你就会弄坏什么东西。”^{[2]166}斯蒂芬一家都沉浸在从未经历过的想象的宗主国神话中,对宗主国中心世界满怀渴望,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

正如叙述者将希望寄托在弟弟身上,“斯蒂芬的思想里和心里全都是他的儿子。他不仅仅是望子成龙,他还有些恐惧。他就像负载着某种会压垮他伤害他的东西。”^{[2]167}儿子出国留学后,斯蒂芬衰老了许多。不幸的是,他的儿子承受不了压力,在异国他乡精神失常了。这一结局暗示了斯蒂芬企图在本土环境之外寻求归属这一幻想的破灭。因而,在斯蒂芬身上足见一个悲哀的精神流亡者的印记,体现了与叙述者类似的流亡历程。疏离、错位和幻灭成为他们的共同结局。

叙述者和斯蒂芬的流亡历程是对前殖民地人民的挣扎奋斗和坎坷命运的生动写照。对宗主国的依赖和模仿是前殖民地国家的普遍社会状况,也是导致故事中的流亡者疏离本土、失却身份归属的主要原因。模仿这一概念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的论述中是殖民地的一种策略,意味着被殖民者“想成为一个经过转换的、能得到认可的他者,一个不同的主体,几乎相同,又不尽相同,它‘是相似同时也是威胁。’”^{[4]1123}但《告诉我要杀谁》反映的对殖民者的模仿则根源于殖民统治,尤其是殖民教育和文化侵略导致前殖民地人民的思想被奴役和僵化。对于大多数前殖民地而言,政治独立带来的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而在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层面,他们

并未摆脱殖民主义的恶果。“殖民主义的真正影响——经济从属于宗主国,文化臣服,心理焦虑——在形式上的独立之后仍持续存在。”^{[5]186}叙述者和斯蒂芬这样的前殖民地人背弃本土文化,无法与之相融,但他们寻求归属的艰辛历程又总是遭遇无情的拒斥,得不到认同,因而始终是局外人、流亡者。无论他们如何奋斗,“都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英国人。他们受到了殖民主义的熏陶,或是继承了文化传统,从而被宣称已成为文明人。可是追本溯源,他们仍又不被当成文明人。他们竭力趋同,却仍被贴上异类的标签。他们效法欧洲人,却又因学样而受到讥笑。”^{[6]132}对西方文明样式的机械复制,如基督徒的名字、外国画子、英国式口音等,不可能使他们摆脱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命运。

三、房子——流亡者命运的隐喻

《告诉我要杀谁》中的房子有着重要的象征涵义。房子的状况暗示了故事中的流亡者最终幻灭的痛苦结局。

叙述者年幼时,乡下的一所水泥建造、外观考究的大房子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吸引力。他每天都看者那所房子,觉得那是富人的住宅,认为房主很伟大,很值得崇拜。但某一天,他惊讶地发现“那个从外面看上去硕大的房子里面真的是很小。”^{[2]167}房子里满是灰尘,空气污浊,“让你觉得任何东西如果被压得太重就会坍塌……那地方好像一个坟墓。就像没有人住一样,那个有钱人好像不知道他为什么建那个房子。”^{[2]167}那个富有的房主和城里的斯蒂芬一样忧虑重重,生活并非舒心。他同家人之间有隔阂,孤身一人住在房子里。某一天,他居然神秘地死于枪杀,他的房子被弃置,日渐坍塌毁坏掉了。

房子通常象征着一个稳定、安全、能遮风避雨并让人舒适的地方。拥有自己的房子能赋予人一种身份感、归属感,从而给人提供了一种奋斗的方向。但事实上,对房子的物质占有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得到期盼的精神慰藉。作品中那所看似壮观的房子和其主人的悲惨结局也印证了这一点。那外表令人仰慕实则内部简陋破败,并最终坍塌毁坏的房子是对作品中流亡者的悲惨结局的隐喻,暗示了前殖民地人民漂泊于异乡寻求身份和归属的努力将以失败告终,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和追求必遭泯灭。

房子的意象贯穿了故事的始终。叙述者后来看到倍受乡下人仰慕的城里人斯蒂芬的房子事实上也是那样狭小破旧,斯蒂芬一家人沉浸在对宗主国大

都市的幻想中,自我欺骗,“像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一样地生活着。”^{[2]76}房子里的一切同样很脆弱颓败,“你感觉不得不弯下腰,如果像平时那样迈一步,你就会弄坏什么东西。”^{[2]76}这是对梦想与现实之间巨大差距的又一次隐喻。

叙述者本人不满于家人的目光短浅,不满于黯淡的本土生活,他离开出生地的房子,希望在大都市实现理想。凭借日夜夜的努力,他得以在伦敦暂获一席栖身之地,有了自己的店铺,有了些许成功感和安全感。但冷酷的现实挫败了他的所有努力,让他一无所有,陷入了难以言喻的孤独和失根错位之中:“神秘的土地是他们的,陌生人是他们。雨中的房子全都不属于你。”^{[2]79}房子象征着叙述者和斯蒂芬梦寐以求但却遥不可及的在宗主国大都市里的安身立命之处和身份归属。他们的命运同时也反映了殖民地、前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去宗主国中心求学或工作的殖民地人,在权力和政治地位上将始终处于边缘地带,不管他们获得或内化多少宗主国文化。”^{[5]13}他们受制于宗主国社会里潜在的规约和歧视,无法被真正接纳并赢得独立的身份。

同本土社会和异域环境双重疏离的流亡者面临着居无定所、精神崩溃的痛苦。在这种痛苦体验中,流亡者从幻想中惊醒,认识到面对冷酷现实理想实现的渺茫和奋斗的空虚。

故事的叙述方式也契合并且强化了贯穿始终的漂泊感和错位、失根感。陷于精神崩溃边缘的叙述者的思绪在过去和现时之间穿梭,在事实与想像之间跳跃,完全打乱了时间顺序和故事的来龙去脉。零碎、不连贯的片段回忆和想像交织成了一幅流亡者疏离、孤独、居无定所的凄惨画面,传达了流离失所的叙述者内心的焦虑、迷茫和痛苦,暗示了流亡者的漂泊辗转,生活原本的有序性被破坏,对理想身份和归属的追寻又充满了不确定性。

作者奈保尔出生于特立尼达,是印度移民的第三代后裔,受教于英国,他在欧洲、非洲和东方之间徘徊游荡,寻找理想的家园。四处漂泊的经历,多元文化背景 and 不同文化的冲突交融为他的作品积累了

深厚的底蕴,使他能以相对客观超然的态度看待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和人民,反思后殖民地边缘文化与欧洲主流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作为一位第三世界的“现代知识分子流亡者”,他指出,第三世界国家的困境不仅仅因为黑暗的殖民统治,其重要根源在于这些国家内部的种种局限性。^[7]

《告诉我要杀谁》通过对个人奋斗挣扎最终幻灭之苦痛经历的勾勒揭示了前殖民地人民缺乏自尊和创造力、对宗主国文化拙劣效法的殖民心态。作品通过个体叙述再现了个体的生存状态,成为民族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作者由此警示新近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要构建独立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从而完全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正如弗郎兹·法农曾指出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亟待摒弃“令人作呕的模仿。”^[8]

参考文献:

- [1] 孙妮. V. S 奈保尔小说研究 [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7.
- [2] Naipaul Vidiadhar Surajprasad In a Free State [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3.
- [3] Weiss, Timothy On the Margins: the Art of Exile in V. S Naipaul [M]. Massachusett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2: 5.
- [4] Bhabha, John Charles Encyclopedia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M]. London: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1.
- [5] Hawley Encyclopedia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M]. London: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1.
- [6] 艾勒克·博埃默. 殖民与后殖民文学 [M]. 盛宁, 韩敏中, 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 [7] 爱德华·W·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 [M]. 单德兴, 译, 陆建德, 校.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49.
- [8] Fanon, Frantz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M].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3: 311.

责任编辑:黄声波